

考试季节里的“烤”与“悸”

The Worries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Period

孟凡茂

(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北京 100044)

每年5月到7月,是全国初、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季节。每当此季,学生老师、家长的心都不约而同地抽紧了。而且,炎热的气候和激烈的竞争构成了“天人合一”般的默契,更让人感到某种窒息的灼烤和惧悸。每到这个季节,方方面面的行动空前一致,五花八门的应试书籍充斥摊店;家教辅导的“课外之课”夜以继日;电视举办的考前咨询、问答让人应接不暇;商家及时推出的营养补品,更必称“益智健脑,考生必不可少”。这之中既有某种诚意的服务,更不乏一场场利有所图的心理商战。因而,每当进入考季,一家家、一校校似乎不分彼此,不容分说:考试压倒一切。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童试、乡试、殿试,想到了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。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这是100年前中国读书人世代相袭的一条仕进之路,只有拼命上路方可为官,方可显赫。多少世代的多少读书人为此耗尽了一生年华和才智。今天教育进步了,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已迥然不同了,但考试的氛围、压力却让人感到与从前仍有着某种相似和相关。为了考试,学生没日没夜地背记不管是否有用的书本知识,演算难而又难、多而又多的备考题目。学生恰似一台台考试机器,进了校门就是考、考、考,回到家里就是备考、备考、备考。人们仍由衷地推崇高考第一名为“状元”,视为菁菁骄子;仍把“带病拼考”视为一种英雄行为,广为报道、赞扬。我们这时不能不深切感到新时代与旧世代之间的某种恍惚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呢?

这一切不禁使我想到了明代的李时珍,他考场失利后,矢志行医采药,终修成《本草纲目》,普济众生;想到清代的蒲松龄,他屡屡败试,虽一生清苦,却以《聊斋志异》留传百世。事业有成与考试优劣并不存在必然联系。尽管历史上不乏有识之士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屡屡剖示,但真正的觉悟者当举上世纪末的梁启超,他少年得志,先及秀才又及举人之后,方幡然有悟,力行变法,倡废科举;再有仕途顺遂的蔡元培,中进士点翰林之后,毅然弃旧官而办新学,树新思,创基业,开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。100年后

的今天,旧的科举考试虽早已被新的考试所取代,然而旧试、旧制、旧魂似未尽散。倘若梁、蔡二公活到今天,不知会作何种感想?他们从旧传统中冲出的勇气、精神和远见卓识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,是否仍应给我们以震撼和启示?

100年前的甲午战争,诺大的中国败给了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,招致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。据说日本把从中国掠去的2万万两白银用于建学校,办了教育。倘若中国胜了,也有这么一笔钱,清朝廷会干什么用呢?前鉴不远不难推断,因为此战前不久,西太后刚挪用巨额海军军费重修了颐和园。今天游园的人们走在雕梁画栋的长廊上,赏望着“勾心斗角”的楼阁,赞叹那鬼斧神工的时候,相信也总会有人想到当年的国耻,想到战败源于国家落后,而根本的落后又是教育的落后。今天国家强大了,为求更快的发展,科教兴国已尊为国策,为国人所共识,然而我们却也常看到最豪华的宾馆旁最简陋的教室;越来越高大的商厦外显得越发窄小的校园。更有甚者,一面动用巨资造阴曹地府修水下龙宫,而另一方面教育经费拮据,学校房危加剧。种种反差强烈的对比,令我们深思: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如何使教育也蓬勃发展?

考试的季节使我联想到,从前旧时代遍地夫子庙,却没有多少象样的学校,而到了现今21世纪来临之际,旧时的这种盖庙热、盖校冷的病态,又萌复见,就让人难以平静了。倘若国民以建庙宇修坟墓的虔诚、庄重与不惜来建学校,以办酒宴上歌厅的热情、潇洒与慷慨来办教育;倘若各方以建电站修铁路的气魄、干劲和投入来建学校,以办商业开公司的那股讲竞争、讲实效的拼劲来办教育,用不了多久,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够水准的学校供孩子们就读了。应试教育终会真正转变为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。

虽人微、言微、论坛微,但事关国运、民运根基之维,切望“潇洒”、“慷慨”诸君莫再“无所谓”!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